

## 郑观应与梁启超的一桩公案

○ 周辉湘

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际，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一封密信，内容涉及梁启超的行踪。一般认为这是郑观应政治态度和人格品质的表现，说明他在关键时刻出卖朋友、落井下石。但仔细考察，存疑甚多。这个问题又关系到对郑观应后期政治立场的评价，不得不辨。

郑观应密告欲置梁启超于死地说，源于他1898年9月22日致盛宣怀密函：“敬密肃者，顷闻梁卓如扮日装到沪，想小田切总领事必知确否，今日相见可询之，不可谈闻于何人。至祷……阅后付丙。”<sup>①</sup>有人据此推断，是盛宣怀曾向消息灵通的郑观应探询过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所在，而郑观应又知道盛宣怀负有逮捕康、梁的使命。因此才写了这封告密信。此信发于政变后第二天，收信人又是盛宣怀，盛在变法期间公开反对变法，主张“朝廷锐意求治，第一在知人用人，否则虽百变其法，而一效难收，甚至求治太急，转为流弊。弟以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，止要兵政、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，厘定章程，实力举办，此即足食足兵之道，无他奇巧。”<sup>②</sup>政变后他又负有这样特殊使命。这样看来，郑观应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首先是时间不符。9月19日，“上诣瀛秀门”，迎西太后还宫<sup>③</sup>。21日，上谕“康有为结党营私，莠言乱政”，革职并与其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<sup>④</sup>，恭请西太后“训政”。23日下令逮捕张荫桓、徐致靖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。28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。29日上谕：“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，所著文字语多狂谬。著一并严拿惩办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，清廷下令缉拿梁启超是在郑观应的密函发出7天之后，在一个星期之前，郑观应又怎能预知清廷下令逮捕梁启超，并匆忙告密抢功呢？

再看盛宣怀负命协助缉拿康有为的时间。9月22日，清廷电荣禄于天津、上海等地严查拿康有为。而康有为已于19日离京赴天津，21日转往上海，他离京是奉上谕往上海督办官报。因之，政变事发，清廷根据其行踪，密飭天津、上海两处缉拿。也在22日，上海道蔡钧接到刘坤一密电：“密速觅线派人会知英领事逐船搜捕”，“密商盛京卿严飭三公司，于今晚明晨由天津来沪轮船下定江中，听候查拿奉旨要犯。”<sup>⑥</sup>这道密电布置对由津来沪中外轮船一体搜查，以确保逮捕康有为归案。9月30日，蔡钧密函盛宣怀，转抄刘坤一密电原文，并附言：“恭筹飭遵，无论北来何船，如遇县委差捕上船查拿，勿稍有阻格。”<sup>⑦</sup>戊戌政变祸起萧墙，事属绝密，外间虽有传闻而不得确知。蔡钧收到密电是在22日午夜，郑观应密函是在当日午时，盛宣怀则又是在次日得知密令。可见郑观应密函在前，蔡钧奉命在后，盛宣怀奉命更在后，这时还谈不上郑观应知道盛宣怀负有使命。连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在22日函电总理衙门，请召张之洞入都赞助新政，郑观应就更不可能知道清廷政变内情了。

其次，蔡钧奉命缉拿对象是康有为，并不涉及到梁启超。刘坤一给蔡钧密电中明白无误告诉他逮捕“奉旨要犯”康有为。就在缉拿张荫桓的上谕中明确宣布对其他人不予追究，其时梁启超尚未被列入缉拿名单，即便是在上海，未奉清廷和刘坤一谕令，也无必要逮捕他。

再其次,盛宣怀在这次行动中的角色是协助,他的具体任务是命令招商局轮船到沪后,不得靠岸,停泊江中待查,在搜查中不得稍有阻格,如此而已。盛宣怀对维新变法是持反对态度,但对梁启超却颇为看重。他对政变后一切复旧也表示不满,认为“训政以来,百事皆归于旧辙,而环海疑议纷腾,以为更新不求实际,复旧又似太激”<sup>①</sup>。应该说,他与顽固守旧派仍有一定距离,在政治思想上停留在早期洋务思想,反对激烈的变法,也反对全面复旧。姑且不论他对康梁的看法如何,未负有逮捕使命是事实。认为他可能向郑观应打听,郑又向他泄密,只是一种推断,并无事实根据。

郑观应把消息限于他们俩人之间,要求“阅后付丙”,目的只是通过盛宣怀向日本领事打听确切。联系戊戌政变前后郑观应对维新派的态度,我认为关注、担忧梁启超的安全更符合实情。他对变法的一贯态度是同情、支持,又不敢过多涉入。维新派很多主张都来自于《盛世危言》,康梁要实行的,也正是郑观应早就提出过的,郑观应与维新派的交往有较深的思想基础。从他们的相互联系看,也并非郑观应事后辩白的“交谊泛泛”。1895年11月,康有为来上海办强学会,郑观应列名董事,同意资助;他赠危言予康梁,梁启超又把书辑入《自强丛书》和《西学书目》;康广仁办自强报,郑观应又列名其中;戊戌年,郑观应也主张“亟宜开国会,立宪法,团结民心,同御外侮”<sup>②</sup>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前,康曾问计于郑政治能即变否,郑观应答曰:“事速则不达,恐于大局有损无益。譬如大指与尾指交,二、三、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。”<sup>③</sup>可见他对当时的形势分析是准确和中肯的。经元善参加维新办女子学堂,函商于郑,他完全赞同,并在他家开过筹备会议,筹措经费办法也是他提出的。从上述事例看出,变法运动期间,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和行为都与维新派相通,谈不上在政治态度上有什么分歧。那么,是否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他卖身投靠呢?情况也并非如此。政变后不几天,郑观应致书迎接康有为的父亲到澳门避难的何穗田,寄100元请他转交康父,说“虽与康南海时尚无交情,惟念其救国之心,罹此重祸,甚可扼腕”<sup>④</sup>。赞誉之情,溢于言表。并且“其旅沪之门弟子,弟已劝其离沪”<sup>⑤</sup>。他赞扬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狱中表现“临大节能如此从容者,盖由学有根柢也”<sup>⑥</sup>。可见郑观应“幸康南海与梁卓如闻风先出”的态度是真诚的。正因为如此,才使他在风云突变,康梁前途未卜之际,为友人担忧,传闻梁启超抵达上海,即探询确否。如果出于告密动机,他可以直接密告蔡钧,无须密友中传递消息。

郑观应与变法又保持着一定距离,他并不积极参加变法活动。这当中有受盛宣怀影响,历经挫折后东山再起怕失去前途等,更主要的是他预感维新变法的前景艰难。所以他对变法运动瞻前顾后,若即若离。政变后,郑观应几遭连累,有舆论说他与维新派关系密切。对此,郑观应匆忙向盛宣怀写信为自己洗刷,称“官应早一年已与督办言及,康梁办事毫无条理,不知度德量力,将来必有风波,岂得谓之同党乎?”<sup>⑦</sup>这是他出于保全自己免被追究,是叶公好龙的一种表现,与绝情断义、落井下石的恶劣品质风马牛不相及。

① 盛宣怀未刊资料:《郑观应致盛宣怀密函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。

② 《盛宣怀复陆伯葵函学》,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,《戊戌亲笔函稿》。

③④⑤ 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4198、4200、4205页。

⑥ 《刘坤一致蔡钧电》,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已刻。

⑦ 《蔡钧致盛宣怀函》,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。

⑧ 盛宣怀:《上庆亲王》,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。《戊戌亲笔函稿》。

⑨⑩⑪ 《郑观应集》(下)第290、1165、1166、1167、1165页。

⑫ 《郑观应致盛宣怀函》,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。

(作者单位:衡阳师专)